

差序格局的数字化演进： 老年趣缘微信群中的层级分化及权力实践

邵婉霞

摘要:以 W 市 B 社区老年艺术团及其微信群为研究对象,讨论数字化时代差序格局的演进。研究发现,老年趣缘微信群中的层级化现象延续了传统差序格局中的“差”和“序”,成员通过“共同体式进入”“功能式进入”“熟人式进入”三种模式融入群体,形成核心人物、骨干人物和普通成员的层级分化。这种分化导致成员呈现不同的权力实践形式,老年趣缘群体中的权力上层会通过建立隐性规约和话语垄断等方式巩固权力,而权力下层则因层级权威和面子问题表现出选择性沉默和被动回应。这种差异化的媒介实践重构了传统差序格局及其权力关系,传统差序格局中的血缘、地缘等纽带逐渐被趣缘、情感等关系补充甚至替代,权力关系也从显性制度转向隐性心理认同。从核心纽带、格局边界和权力实践三方面重新审视经典差序格局理论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变迁,为理解老年数字社群中社交关系的动态变化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关键词:差序格局;老年趣缘;层级化;权力实践;微信群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6)04-0017-11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社科青年项目(CSQZY24009)

一、研究缘起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以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为标志的技术革新为传统人际互动模式的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和环境支撑。在这一背景下,微信群作为即时通讯工具的典型代表,凭借其便捷性、即时性和多媒体交互特性,成为社会关系重构的重要场域。随着线上社交的普及,社群人际互动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样态,这种虚拟空间中的交往行为延续并突破传统社交的边界,形成独具特色的数字社交生态。网络媒介的出现使同一群人的线上与线下人际交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孙信茹在对云南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研究中发现,那些与她交谈的年轻村民在现实生活中大多羞涩、不善言辞,但在微信群中往往却能直抒胸臆、乐于交谈与分享。这是因为微信这一平台不仅能够帮助普米族村民展现与表达自我,还能够创造出脱离现实情境的“理想化自我”。^[1]然而社交媒体的影响并非均质的,在对 W 市 B 社区老年艺术团及其微信群的考察中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图景:多数成员在微信群中保持着沉默,只是偶尔才发送一些“好的”“收到”等简短话语来进行最低限度的互动,但在现实生活中成员们却十分乐于谈论与交流,并没有呈现出沉默的状态。这种线上沉默与线下活跃的鲜明反差,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数字时代的行为模式:相较于前者所描述的“线上活跃—线下内敛”状态,本研究所发现的“线上沉默—线下活跃”现象折射出的是数字时代差序格局的隐蔽演变。本研究并非想要提出一个适用于所有开放式线上老年社群的普遍规律,而是试图通过对老年趣缘社群成员行为模式的探讨,聚焦线下熟人关系如何以线上媒介技术为中介完成数字交往与权力的再生产。具体而言,研究聚焦以下问题:①老年趣缘群体中,数字层级的分化影响因素是什么?微信群特

有的技术可供性,如何与传统的面子文化相结合,催生出有别于传统差序格局的新层级结构?②线上社群的层级化如何体现出权力关系的延续与变化?不同权力层级的媒介实践有何差异?③技术赋权是打破了传统等级机构,还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强化了既有权力关系?通过解答以上问题,本研究旨在反思差序格局在数字化熟人社群中的适用边界,透视数字媒介如何建构当代老年趣缘群体的交往关系。

二、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 数字环境下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最早是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用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这一概念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石头投入水中那样,以自己为中心,与别人的联系就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26}因此,个体与个体之间因为血缘、地缘等关系的不同而呈现出涟漪式的结构,他人与自身都有亲疏远近之分,家人、宗族成员、朋友、陌生人依次处于自己网状关系的内圈、外圈。在社会学视域下,差序格局是理解中国社会关系与文化逻辑的重要理论工具,它既揭示传统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也为分析当代社会变迁提供参照。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更迭,差序格局的理论边界与解释效力有待重新界定,讨论数字时代的差序格局对重思中国社会结构与探索新型人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技术可供与场景演进为差序格局的讨论提供了新的平台,这类考察并不是单纯地从数字化环境下差序格局的概念、意义等单一问题出发,而是将其放置在新社会现象中讨论,比如乡村数字文化传播、老年数字鸿沟等。例如,以差序格局为理论框架来讨论农民蹭 Wi-Fi 这一现象,从空间、官民、贫富、亲缘四个方面的差序来表现出这种“媒介共享”的现象与文化,并提出乡村社会中资源与基础设施不平等的问题。^[3]还有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用差序格局来讨论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乡村文化,认为城乡文化传播呈现非均衡状态,分析乡村文化传播的差序性,着重强调城乡文化之间的鸿沟。^[4]同时在农村老年人群的数字反哺中,催生了知识差序格局,这种知识差序相较于传统差序格局的差别在于,它打破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传统人际格局,以对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作为划分差序的核心依据。^[5]

可以看出,当前差序格局的理论已经在中国农村数字环境中生长出新的枝叶,展现出概念的经典性与延展张力。这主要源于差序格局自身的适配性,该理论的生长环境主要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但是如果将其移植到现代城市环境中,它还能继续“生长”和适配吗?有学者以外出打工的农民为研究对象,提出“城市版”差序格局这一说法,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的作用下,差序格局并没有消亡,而是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形成基于理性意志的新差序格局,这种新差序格局是对传统差序格局道德性的瓦解,是基于特殊主义和情感偏向的重建。^[6]比如在理论的应用主体上,过往的研究将重心放在传统的人与人上,如今也有不少研究的应用主体为“非人”,如外卖平台^[7]、媒介空间中的情感^[8]等;同时在应用场景上,传统的差序格局强调的是人与人在现实情景中的关联,而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种场景已经延伸至线上的虚拟空间,如家庭微信群^[9]、团购微信群^[10]等。差序格局的概念在当前数字城市环境中拓展出新的研究论域和应用偏向,迫使我们不断探索经典理论跨越时代的研究张力。

(二) 问题的提出

差序格局是一个立体结构,既包括横向的“差”,也包括纵向的“序”。以这一观点来审视前述的研究,会发现对于“序”的讨论并不深入。比如在讨论老年人接受子代传递的科学信息时,会呈现知识差序而非血缘差序的新格局,尽管知识掌握这一核心依据的等级十分明显(如学历),但研究者并没有细分这种等级,也没有讨论。那么在数字环境下,这种立体结构是否遭到了冲击?张杰等人是在对“中国式数字断连”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发现,这种立体结构,尤其是纵向的“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反而表现出一些新的情感表达与建构特征。^[11]因此,在探索数字技术下的差序格局时,不仅要

展现横向的“数字化差异”,同时也要对纵向的“数字化等级”做出相应的考量。

针对“数字化等级”这一维度的讨论,可以从网络“圈层化”这一概念入手。网络中的圈层化这一概念既包括圈子化,又包括层级化。圈子化是指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比如二次元圈、饭圈等^[12],着重强调圈子与圈子之间的差异化,是横向的。而网络层级化既源于现实的社会阶层,又与网络中的各种其他因素相关,这种层级化不仅意味着不同人群之间有差异,还有“高低落差”。^[13]这着重强调层级与层级之间的高低,是纵向的。“圈”与“层”是两个不同的分化方向,存在着不同的分化逻辑。因此本研究借用“层级化”这一概念来着重讨论技术环境下差序格局中“数字化等级”的问题。

考察“层级化”离不开“圈层化”中的“圈”。圈子是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这种聚合的表现形式便是群体这一实物,它是层级化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群体内部出现的权力分化是对差序的又一次写照,其原因便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因人而异的,这种与群体的不同强弱关系构成“差”与“序”,呈现出强弱连接的不同趋势。

作为群体的媒介反应,微信群已然成了人们维持与新建关系的新型公共空间。^[14]那么在线上环境的场景中,这种“差序”,尤其是“序”是否存在呢?尽管在微信社群中并没有存在等级标识这样的实物来直接表示层级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层级化的消失。这种层级化概念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然后投射在实践上形成层级化现象。这一现象表明技术并未真正弥合层级,而是以新的方式再现甚至强化既有的权力结构。需要思考的是,这种层级化现象从何而来?差序格局中的等级化在数字化环境下是如何表现的?其权力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与延伸?本研究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为框架,通过对某艺术团微信群的深入考察,试图揭示数字社群中的层级化与权力实践的运作机制。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选取 W 市 H 区 B 社区 QZY 艺术团作为田野对象展开调研,主要基于以下考量:一是该艺术团每周有固定的活动时间,选择该艺术团作为对象能更好地进行参与式观察和访谈。二是该艺术团于 2022 年成立,架构与人员较为完善,微信群的使用十分成熟,成员间的交往较为活跃,线上与线下的互动错落有致,适合研究开展。

访谈内容主要围绕成员加入艺术团的方式、艺术团内部的主要活动、微信群中的发言内容与频率、艺术团线下线上社群的交流细节等问题展开。该艺术团每周三、周五 13:30~17:00 集中进行活动排练,因此访谈的频率为一周两次,一次一至两人,主要访谈时间为排练开始前或结束后,地点集中在排练活动中心。具体开展调研的流程如下:2024 年 10 月,笔者进入 B 社区并与 QZY 艺术团取得初步联系,对此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初步观察,发现在该艺术团中“隐性”的等级观念较为明显,且在微信群中也有所涉及。2025 年 1 月,设计研究议题与访谈提纲。2025 年 2 月,开始正式访谈,主要针对艺术团中团长、总编导、乐队总指挥等具有一定威望的成员进行 60~90 分钟的个人访谈。2025 年 3 月则主要针对艺术团中的普通成员、刚加入的成员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等展开 30~60 分钟的个人访谈。两个阶段一共选取了 14 位访谈对象,详见表 1。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
F01	女	64	艺术团团长
F02	女	63	艺术团总编导
M01	男	64	艺术团乐队负责人

续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
F03	女	65	艺术团领唱
M02	男	66	艺术团领唱
M03	男	65	艺术团指挥
F04	女	60	普通成员
F05	女	68	普通成员
F06	女	63	普通成员
F07	女	65	普通成员
M04	男	61	普通成员
M05	男	68	普通成员
F08	女	48	B 社区工作者
F09	女	47	B 社区工作者

四、群体进入机制催生层级分化

针对群体中层级化现象的由来这一问题,文章试图从“个体如何进入群体”这一视角来进行阐释。这一分析路径主要基于以下考量:一方面,费孝通所论述的差序格局虽然揭示了传统社会中通过血缘、地缘等关系网络所带来的不同层级,但在当代社会,群体的构成要素已远超出这两大范畴(比如还有业缘群体、友缘群体等),因而需要更具动态性的分析框架来讨论不同群体中的层级分化。另一方面,若要探究群体中的层级化现象,必须追溯群体形成的初始阶段,而这一过程必然涉及“成员准入机制”问题,即个体通过何种方式、以何种身份加入群体。“进入”不仅是个体时空位置的转移,更是数字资本与心理预设的分配过程,为层级的分化奠定了基础。个体通过何种模式“进入”、其与群内成员的关联方式以及准入资格,往往决定了其在社群网络中的初始位置,即处在“涟漪”的边缘还是核心,也成为其后续话语权与地位分化的重要来源。例如,某些进入群体的成员可能因“资历与经验”获得更高的话语权,或因突出贡献成为核心人物。透视“进入”这一微观动态,才能理清数字层级分化从无序到有序的建构逻辑。

因此,从“个体进入群体”这一微观机制入手,不仅能避免宏观历史分析的冗杂,也能突破传统差序格局的理论局限,从而更精准地捕捉数字化时代下群体层级化的生成逻辑。基于上述考量,本研究引入舒茨的人际关系三维理论作为该部分的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与别人建立人际关系的需要和愿望,只是有些人表现得明显,有些人表现得不明显。这种需要又可以分为包容需要、支配需要和情感需要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虽然同时存在,但在特定情境下会有一个维度表现得更突出。^{[15]17-20}结合对 QZY 艺术团成员进入方式的考察,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模式,分别是“共同体式进入”“功能式进入”“熟人式进入”。不同的进入模式不仅会形塑群体成员的层级位置,还会影响其后续的话语实践方式,而话语实践的差异又会反作用于群体结构,进一步强化既有的层级分化,从而形成动态维持机制。

(一) 权力中心:核心人物圈的“共同体式进入”

一个群体的建立发展与核心人物是密不可分的,而围绕核心人物所展开的核心人物圈是我们探究群体层级的立足点。在 QZY 艺术团这一群体中,作为资深艺术爱好者,F01 退休后长期从事歌舞活动,其组建艺术团的动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因其艺术造诣获得同龄人的追随,二是社区书记基于对其能力的认可而频繁邀请她参与社区演出。正是这些互动逐渐促成了艺术团的诞生。在群体

运营过程中,F01 承担了包括团队注册、场地协调、道具管理等诸多事务。这种投入不仅体现了领导者的责任感,更反映出强烈的情感联结。如她坦言:“虽然筹备(节目)很辛苦,但就是在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我跟团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F01)

人际关系三维理论中的情感需要是指个体会通过表达自己的感受、对他人予以关怀、建立深层关系和寻求情感互动等方式来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由于对音乐舞蹈有着浓烈的情感寄托,这种情感寄托会随时间转变为对团队呕心沥血的付出,从而使 F01 成为群体的核心人物。在核心人物身上会呈现出一种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在趣缘群体中以兴趣与情感为纽带,个体与事物之间会建立深层的联系,逐渐将“个体化”的成员重新聚拢一起,^[16]从而发生情感互动的行为。这一方面能够满足个体的情感需要,另一方面也能促进群体的发展。因此,研究将以 F01 为代表的核心人物进入群体的模式定义为“共同体式进入”。

在趣缘社群中,“共同体式进入”以情感联结与兴趣认同为核心驱动力,个体基于对某一目标(如艺术追求)的深度情感投入,主动承担起群体内部责任(如发起、运营),通过持续的情感互动与价值共鸣形成“共同体意识”,进而成为群体核心层成员。该模式以人际关系三维理论中的情感需要为基础,强调个体与群体间的深层情感纽带,典型表现为个体人物通过自身艺术热爱与组织投入来凝聚成员,形成以“趣缘+情感”为纽带的权力中心圈层。“共同体式进入”的核心人物圈毫无疑问构成群体内的第一阶层,其权威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他们拥有制定和执行群体规范的权力;这种权威在线上线下场域相互强化。^[17]F01 同时担任线下团长和微信群主的双重角色,既掌握线下事务决策权,又享有群管理特权(如禁言、踢人等)。这种权力结构的延续和强化,正是群体中层级化的重要表现。

(二)分工协同:骨干成员的“功能式进入”

群体结构的演进不仅依赖于核心人物的引领,更需要各层级成员的协同配合。在 QZY 艺术团中,作为一个基于个人兴趣建立起来的歌舞共同体,其日常运转生动展现了成员在技术与组织层面的分工协同。这种协同不是基于线下的个人社会身份,而是基于专业能力的有机协作。“在这个团里我们不仅要会唱会跳的人,还要那些能弹奏乐器,懂得为那些能唱能跳(的人)做配角的人。”(F02)这种多元化的角色需求,构成了趣缘群体层级化的现实基础。支配需要是指个体具有控制他人或被他人支配的需要,在控制他人方面,个体可能会扮演领导、支配者的角色,而在被支配方面则会扮演配角、被支配者的角色。作为核心人物的第一层级成员需要思考群体的不同层级,并将不同层级从自身发散出去,在规定层级的同时不断吸纳不同成员,从而发展扩大群体。一方面,核心人物需要吸纳专业人才来实现群体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专业人才也通过贡献独特技能获得群体的认可。在群体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专业人才成了群体骨干成员,比如领唱、编导、指挥等。凭借着自身的功能性,他们成了群体中的第二层级。

面对第二层的骨干成员,团长表示:“张老师和王老师都算是我‘挖来’的……社区书记带着我去了张老师家里,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加入我这个艺术团。王老师也是张老师拉进来的,她编排节目,情景剧之类的可厉害了。他们进入团队后,我的压力就小了很多。”(F01)这里由支配需要所引发的人际关系需求是在核心人物与骨干人物之间发生的,即第一层级与第二层级之间的双向协同。这种基于功能需求的吸纳过程,与“共同体式进入”形成鲜明对比:前者以“我需要你的专长”为特征,后者则以情感联结为基础。因此,我们将这种以功能互补为特征的加入模式定义为“功能式进入”。

“功能式进入”是一种基于专业技能分工互补与群体功能需求的层级化进入模式,即个体因具备整个群体发展所需的特定能力,被核心层以功能填补为目标而被吸纳,通过贡献不可替代的专业价值,在因相同爱好而相聚的群体中获得骨干地位。这种模式主要体现为核心层对群体资源的规划与支配(如团长主动“挖角”专业人才),以及骨干层通过功能输出实现自身价值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功能式进入”形成的层级结构会在线上线下场域呈现出差异化表现。在线下场景中,专业功能的价值更为凸显,其实际影响力有时会超越层级限制而向上移动;而在线上趣缘社群中,其话语权力并没

有得到放大,反而呈现缩小、向下移动的趋势,这在后文中会进一步解释。

(三) 边缘参与:个体流动下的“熟人式进入”

老年趣缘群体相比年轻趣缘群体,会呈现出独特的参与特征,这种独特性主要源于两个层面:城市化进程弱化了传统血缘聚居模式,使地缘关系成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考量;部分老年人作为“数字难民”^[18],对于线上各类趣缘活动难以完全参与,甚至可能会出现抗拒心理,而物理空间的邻近性则为老年人参与趣缘群体提供了可信任的安全渠道。在这一情况下,居住在同一社区或附近的邻居朋友等熟人成了老年人因兴趣而聚集在一起的高效渠道之一。

基于“熟人机制”进入群体的模式与“链式流动”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链式流动原本是美国社会学家在研究移民问题时所提出的,具体是指迁徙目的地的人口为新移民提供帮助、资讯和鼓励,促成一组组相关的个人或家庭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丁未借用此概念来解释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流动模式,即以血缘、地缘为主线的“一个带一个”流动模式。^[19]¹⁸⁰以这一概念来审视个体进入群体的模式,可以发现两者有共同之处。群体内的成员提供进入群体的渠道,并且其存在能够为非成员的进入降低风险,促使非成员从群体外这一环境迁入群体内的新环境。这种基于群体内部有“熟人”的进入模式被称为“熟人式进入”。

相比于“共同体式”和“功能式”,“熟人式进入”则是通过地缘、人缘等既有社会关系链来实现的边缘性个体融入模式。在该模式中,个体借助邻里、朋友等熟人引荐而进入群体,以满足包容需要为核心动机,寻求社交归属感与情感支持,而非直接指向趣缘群体的核心目标(如艺术创作)。个体进入群体后多处于参与度低、决策权弱的第三层级,其层级定位依赖既有社会关系而非群体目标认同。通过考察发现,艺术团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以“‘熟人式’进入的模式进入群体的,用他们的话来讲:都是些熟人朋友拉我们进来的。”(F07)

这些成员构成了群体结构的第三层级,与第一、第二层级相比,成员们的“趣”关系更加边缘,呈现出“边缘参与”的特征。这种“边缘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活动出席率较低,决策参与度有限和专业技能投入较少。第三层级更多是基于人际关系三维理论中的包容需要而入群。这里的包容需要是指个体与其他个体接触、交往、相容的需要,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其本质特征便是寻求归属感和认同感,而这种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实现方式最常表现为参与社交活动、与他人建立联系等。在群体中,包容的需要是最常见的同时也是最容易满足的需要,因此所涉及的群体成员包括绝大多数的普通成员。在该趣缘群体中,第三层级成员的媒介实践兼具身心健康调适与社会资本重组的双重需求。老年行动者能够通过朋辈互助机制,应对外部生存的时空变迁。数字空间的迁徙使传统关怀场域发生一定程度的解构,必须通过技术重构新的关怀接触点^[20]。他们在进入艺术团之后所体验的同辈之间的社会帮持能够更大程度上弥补家庭、子女对老年人关爱不足的问题。^[21]此时去中心化的微信群不仅是信息分发的器物,更升级为一种数字关怀关系的孵化器。处于边缘层级的普通成员通过高频次、低门槛的互动,让缺位的关怀关系在线上完成功能性代偿。

五、线上层级裂变:技术可供性支配下的数字权力实践

老年艺术团的成员们在建立微信群时,表面上看是在建立一个扁平自由的交流空间,但在实际交往中却分化出不同的层级。这种线上层级的产生,与微信的数字环境密切相关,其功能设计在无形中规训了人们的交往边界。这种由技术功能与用户的媒介使用所激发的“行动可能性”正是微信自身的“技术可供性”^[22],它通过对“谁能发言、谁的信息可见、谁掌握管理权”的权限设定,直接决定群成员在数字空间里的行为边界。这种技术上的不对称,让线下的静态角色规范和制度文本形成的组织规制转向线上依托媒介技术支配的权力实践,原本扁平的线上空间也因此被压缩成一个纵向的权力控制网络。

(一) 权力顶层的技术规训:规则与话语的垄断

传统差序格局在数字环境下并非线性延伸,当社交平台的技术可供性与老年趣缘群体的社交文化习惯相碰撞时,形成支配信息传播与人机互动的新规则。在微信群的场域中,个体的数字化层级与艺术团线下的原有层级之间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发生一定程度的裂变。线下的分层主要体现为传统的行政职务,例如团长、编导,以及社会地位,例如有一些成员退休前是干部身份或者有高知背景。然而线上的数字层级的分化则演变成线下职务、技术能力与趣缘核心资产的掌控权等多元素的动态结合,这种交往的逻辑转化呈现出技术特权的不对称现象,它将线下的组织规制推向了权力实践的视角。原本的组织规制是更为显著的条文式的行为约束,而技术媒介则赋予个体掌握执行工具的权力。例如微信群主拥有撤回他人消息、禁言、群公告提醒、“踢人出群”的技术特权。权力的顶层无形中掌握了成员在数字交往空间的去留权。当这种技术特权与线下的权威相叠加,原本扁平、互动的线上空间转化成一个纵向的、具备技术强制力的权力层级结构,带来了全新的权力支配。

1. 隐性规约的驯化

数字权力的微观规训并不依赖于显性的文本语言,反而表现为权力顶层通过不经意的口头公告,将线下的组织规则转化为隐性的层级公示。初次进入该艺术团体时,并没有在“群公告”这一功能处发现明文规定,而且群内成员的发言也不算太多,大部分只是说着“好的、收到、OK”之类的简短话语。但在多次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这种“安静”的背后其实大有文章,尽管没有明文的群内规约,但规约的意识在每个成员心中都十分牢固。追根溯源,F01在建群之时就已说明:“我跟他们(成员)说了,这个群不要搞成那种杂七杂八的,大家也不要群里发不相关的言论,这个群只是我们通知信息,方便大家的。”一些成员也对此进行回应:“对的,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大家在群里不要说不相关的,简单一点最好。现在群里说‘早安、晚安’之类的都很少了,只有像是春节、端午节才会在群里说些简单祝福,发红包也不可以。”(M05)在谈论到为什么没有明确的规定时,F01表示:“我年纪大了,搞不来那些,所以就干脆没弄,就算弄了他们(成员)也搞不懂,但是规约是有的,他们都知道,都心知肚明。”尽管F01以“年纪大不擅长”为由拒绝文本化规约,但群体成员对潜在规则的默契遵守,表明这种“去规则化”现象是对隐性权力驯化的具象化体现。

2. 话语的单向垄断

老年微信群的数字权力的操控不仅体现在规约的建立,也表现为对媒介话语权的绝对垄断。这种垄断体现在日常信息的传达与集体记忆的书写等多个方面,建构起偏向单向话语输出的交流方式。

在日常事务层面,这种垄断表现为即时信息的单向流动。该微信群内最常见的消息便是作为“议程设置者”的团长发布的各类公共信息,包括节目排练信息、节目名单信息、更正信息、注意事项等。而团长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信息的创造者,比如对于节目排练信息的生成,排练时间地点、成员分工等都是由团长来决定。信息的单向流动强化了层级之间的权力差异。^[23]这种权力差异经常处于一种“极端”状态,有时团长会因为疏忽或大意发错通知,比如把排练时间的周五错发为周三(艺术团每周三周五下午进行排练),这种明显的错误在群里并没有人出来纠正团长,一些成员当作没看到,另一些选择私下和团长说明,团长在发现错误后才会群里发布更改后的信息。这种“极端”状态的行为模式反映出数字社群中权威的不可挑战性。团长不仅是信息的创造者,更是“权力”的垄断者。

这种日常的单向灌输,进一步沉淀为对艺术团集体记忆的垄断书写。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它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24]335}微信群与智能手机的结合虽使记忆的数字化留存唾手可得,但其发布权同样被高度集中。团长在排练与表演时进行选择性拍摄并上传,在内部建构起团队的“奋斗叙事”;同时通过微信视频号等公域平台发布,在外部打造出

群体的“展示性记忆”。正如一位普通成员所坦言:“我们在群里看、在朋友圈转的,都是团长发出来的视频。她拍得特别好看,还配上很正能量的音乐,写着‘快乐养老、老年风采’。大家看了都拼命点赞……时间长了,那些视频里放的好像就是我们艺术团的全部历史,平时训练再苦再累,看着视频就只剩下荣誉感了。”(F03)成员对这些定制化数字记忆的认同,让个体的情感体验自觉顺从于组织的叙事,强化了团长作为社群“历史书写者”^[25]的权威。借助微信信息可回溯性的功能特性,这种单向建构的组织记忆得以跨越物理时空的限制,最终实现线上线下权力差序格局的再生产。

(二) 权力下层的技术顺从:面子文化与选择性沉默

在微信群不对称的技术可供性约束下,原本在线下凭借专业能力确立的第二层级(骨干成员),在线上场域遭遇话语权力的下沉。同时,微信群聊的功能架构对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进行二元划分,并未对骨干与普通成员进行技术权限的细分。这种技术层面的降维平权,导致第二层级与第三层级(普通成员)在线上呈现出媒介行为的高度同质化,因此研究将二者合并为统一的权力下层。作为自愿加入的趣缘共同体,下层成员在面对顶层的技术规训时,出于对数字技术的学习与适应以及对社群人际网络的敬畏,展现一种策略性的“技术顺从”。这种顺从并非消极的无能为力,而是本土化人情惯习在数字权力场域下的映射,传统的交往惯习被赋予深层的数字色彩,在线上交往中衍生出一套兼顾面子文化与社群和谐的隐性行为逻辑。

在QZY艺术团的微信群中,微信的公共可见性成了一种强大的景观化的规训力量,与中国传统的面子文化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微信群作为一个数字前台,任何一条言论都是对全群成员公开可见的。这种全景敞视的技术特征,使得权力的运作和面子的维护都遭遇成倍放大。当团长在群内发布信息或偶尔出现口误时,技术特权赋予其“信息首发者”的权威,而全群可见的压力则瞬间施加给下层成员。在传统面子文化中,当众纠错是对上位者威信的极大损害。因此,微信群的公共可见性直接导致了成员采取选择性沉默。“她是团长,我就是很普通的(成员),所以尽量不会说些不得体的话,尤其是在微信群这样一个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有些时候她(团长)搞错了大家都知道,这很正常,没有必要非要说出来,搞得都不好意思。”(F04)这种沉默并非技术使用的疏离,而是技术可供性与面子心理的文化惯习合谋的结果。群主的技术特权保障了信息流向的单向性,而公共可见性则将传统的“尊尊、亲亲”伦理转化为一种线上的沉默共识,锁定了数字技术对传统权力的重新赋能。

沉默或附和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维护“面子”的媒介实践。面子是由人们彼此交往后产生的“别人怎么看我”的问题^[26],也就是自身在他人那里的心理地位,这种心理地位是个体对于他人实际地位的真实反应,是等级化的生动写照。这一媒介实践既避免对权威的公开挑战,也巩固群体内部的等级秩序。在老年趣缘微信群中,这种对权威的尊重和对顶层“面子”的维护通过沉默的数字交往行为被不断再生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数字沉默与线下成员乐于交流分享形成鲜明对比。在面对面交流中,成员们更倾向于自由表达,甚至主动提出建议。这种差异化表明微信群的“公共可见性”放大了权力上层的权威,使得成员不得不采取更为谨慎的互动策略。可以说,沉默或机械回应的行为是成员主动做出的策略性选择,差序格局的层级与等级化通过这一机制得以固化。

六、结论:趣缘微信群中的差序层级与权力隐蔽

本研究通过对QZY艺术团微信群这一案例的考察,揭示数字化时代下差序格局的演变。研究发现,老年趣缘微信群中的层级化现象一方面延续传统差序格局中的“差”与“序”,核心人物、骨干成员和普通成员分别以“共同体式进入”“功能式进入”和“熟人式进入”三种模式融入群体,形成清晰的层级分化;另一方面这种层级化现象还通过“趣缘”这一新纽带重构传统差序格局及其权力关系。这种重构将传统依据亲疏建立的亲缘关系、熟人关系逐渐打破,技术背景下的数字化交往实践成了新的评判标准,呈现出从传统农村环境下的“差序格局”到数字环境下的老年趣缘群体中的“差序格局”的变迁。

(一) 核心纽带:从血缘勾连到趣缘主导的关系重构

传统乡村的差序格局讲究的是血缘的先赋性和不可选择性,即便权力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差序格局的变化,但血缘宗亲关系始终是“亲疏分层”的基本判断标准。然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差序格局的形成因素打破了单一性决定条件的绝对地位,转向更为丰富的多因素嵌合。在本案例中,老年微信群的差序纽带以趣缘的选择性为核心,形成了层级分化的又一标准,人们根据与“趣”的不同强弱连接来决定自身处于哪一层级,以对趣缘群体的价值贡献作为圈层位置的划分标准。与传统以血缘关系作为判别不同的是,这种新标准在个体中充满能动性。传统差序格局建立在特定的“差序”身份基础之上,比如血缘、婚姻、宗族等,这类身份关系稳定性较强^[27]。但在数字化环境中,这种“先天性”难以满足人们在其他领域的需求和标准,与此相对“后天性”的能力与情感正在主导着人们走向不同的位置,人们根据自身不同的情况与需求来决定自身在差序格局中处于哪一层级。这种能动性表现出“先天性”的血缘、地缘关系正逐步被“后天性”的能力、需求以及情感所取代。正如一位成员在采访中所表示的:“团长这个位置我觉得十分重要,不仅要有人格魅力,还要有组织能力。你叫我来当团长肯定是不行的,我能力不行,唱得不好,跳得也不好,更别说还要带动这么多人,我觉得我还是当一个跟随者比较好。”(M04)

(二) 格局边界:从封闭刚性到开放流动的圈层拓展

传统乡村差序格局的边界主要由物理空间位置(如村落)与血缘伦理的双重要素来划定,呈现出鲜明的“对内封闭,对外排斥”的刚性特征,成员之间的身份界定更加稳定,例如“王家后人”“张村话事人”等,想要改变这种身份的界定非常难,同时外部人想要融入该群体也受制于宗族许可、地域认同等多重限制,想要打破这种封闭格局的边界几乎不可能。然而QZY艺术团微信群的层级化实践表明,该趣缘群体的边界转由数字连接与个体参与意愿所决定,呈现开放自由与进出弹性的动态特征。首先,趣缘群体的进入门槛相较于传统乡村格局更低,只要有共同的艺术爱好,即便不是该社区的居民也可以加入。其次,退出成本低,成员可结合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否要承担接送孙辈的任务而随时调整参与社群活动的频率,甚至直接退出该群体。最后,圈层的流动性更强,同一个老年人可以依据不同的兴趣爱好加入多个趣缘群体,并在不同的差序格局中承担不同的角色,这与“单一差序圈层绑定”的传统乡村格局形成了巨大的对比。需要强调的是,数字技术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伸缩调节作用,技术并非差序的“解构者”或“复刻者”,而是成为差序格局演变的“塑造者”。这种塑造通过微信群实践得以实现,传统差序格局中“尊尊”的等级秩序,在微信群中转化为技术赋能与文化惯习的双重约束。一方面,权力上层通过群功能将传统差序中的等级关系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能力,从而形成可见的权力象征;另一方面,权力下层因面子文化驱动的选择性沉默以及隐性的群规,通过心理认同来维系差序,形成不可见的文化惯习。可以说,在数字化环境下,虚拟微信社群成了差序实践的新型载体。

(三) 权力实践:从显性权威制度到隐性心理认同的媒介实践

传统的乡村差序格局的权力实践依赖于“血缘+制度”的双重显性权威,其中核心权力(如宗族长老)的合法性来自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辈分伦理与各类约定俗成的治理制度,权力通过公开规训的方式在众人面前展开,反抗与质疑的声音很弱,因为一旦产生便会面临违反公序良俗的舆论压力。汉密尔顿在研究中国家族制时认为,宋明新儒教强调孝顺、服从、强化父权,并推动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制度化,发展出一套社会角色制度,这一角色制度经过自上而下的规范化,强化了社会角色的责任与义务,在明清两个朝代推动了泛家族制在不同领域的扩散以及权力顺从的制度化,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范式,这种家族制从而孕育出了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结构。^[28]从汉密尔顿的研究中我们能够发现,在差序格局中的权力关系具备一种“可见性”,即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是能够被人“看见”的,只有“看见”这种权力结构,个体才会清楚自身作为某一社会角色的责任义务。而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加持下的权力结构正在逐渐隐蔽化。在老年趣缘微信群这一场域下,权力的实施

转向了“媒介行为+心理认同”的隐性权威表达。其权力关系通过上层的技术操作与下层的面子文化、“无形”规约得以隐蔽。这种被隐蔽的数字化权力更依赖于成员的心理认同,而非传统差序格局的强制规定,呈现“新”差序格局在网络空间中的柔性渗透。可以说差序格局在数字环境下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以等级化为特征的群体不仅在技术的加持下得到展演舞台,还将其中的权力关系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延续。值得一提的是,在老年趣缘群中的“选择性沉默”并非出于对制度惩罚的恐惧,而是对于面子损失的合理考量,这与传统乡村的“公开羞辱式约束”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这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与数字空间交往不断生发出的人情弹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拓展差序格局理论的应用维度,同时也揭示数字社群中社会关系的动态变化。差序格局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语境的主要行动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下的转变是必然的。在该老年趣缘群体的案例中,个体的“能动性”在层级分化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技术、心理等因素的介入使得权力关系从“看得见”的规则约束转向“看不见”的心理认同,展现出一场由在底层技术支配与人情惯习共同作用下的数字层级分化与权力展演。

本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为了更好凸显讨论的主题,研究聚焦老年趣缘群体,以此来讨论传统差序格局的变迁与延伸,但该群体受文化水平、家庭经济基础、兴趣爱好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可能在数字使用习惯、社交模式等方面呈现圈层的特异性,无法代表不同需求和不同文化程度等复杂情况中的老年群体,因此研究结论的普遍性会有局限。未来需要开展对更多类型、不同社会身份的老年群体进行更大范围的研究,以便更为完整地阐释数字群体及其实践背后的差序格局变迁。

参考文献:

- [1] 孙信茹. 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10): 6-24+126.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3] 刘战伟, 刘蒙之. 蹭 Wi-Fi: 一项差序共享媒介基础设施研究. 新闻与写作, 2023(1): 67-78.
- [4] 陈燕. 二元结构下乡村文化变迁的差序传播与重构. 新闻界, 2017(9): 44-48.
- [5] 谢兴政, 张大伟. 从关系差序到知识差序: 农村中老年人数字反哺研究——基于科学信息传播的考察. 编辑之友, 2024(4): 48-55.
- [6] 肖瑛. 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探索与争鸣, 2014(6): 48-54.
- [7] 张杰, 许琪. 以“差”破“序”: 美团商家平台劳动的本土化调适研究. 传媒观察, 2025(6): 15-27.
- [8] 郭小安, 卢松岩. 从人际结构到情感结构: 网络空间的新型差序格局及话语策略. 新闻与写作, 2025(2): 29-38.
- [9] 吴静. 论微信群对中国家庭权力关系的重构.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3): 164-166.
- [10] 易若彤. 差序格局与信任困境: 疫情之下社区团购志愿者与居民的关系建构. 传媒观察, 2022(5): 49-56.
- [11] 张杰, 杨欣怡, 黄从严. 疏联: 中国式数字断连与差序格局变迁——以微信“已读不回”为中心. 国际新闻界, 2025(1): 114-134.
- [12] 彭兰. 网络的圈子化: 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 编辑之友, 2019(11): 5-12.
- [13] 彭兰. 网络社会的层级化: 现实阶层与虚拟层级的交织.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3): 9-15.
- [14] 牛耀红. 在场与互训: 微信群与乡村秩序维系——基于一个西部农村的考察. 新闻界, 2017(8): 2-9.
- [15] SCHUTZ W C. FIRO: a three-dimensional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58.
- [16] 王倩楠. 情感共同体: 明星“人设”现象背后青年重建社群的尝试. 中国青年研究, 2018(8): 94-101.
- [17] 蒋建国. 微信群: 议题、身份与控制. 探索与争鸣, 2015(11): 108-112.
- [18] 周裕琼. 当老龄化社会遭遇新媒体挑战数字代沟与反哺之学术思考. 新闻与写作, 2015(12): 53-56.
- [19] 丁未. 流动的家园: “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 [20] 武文颖, 管声华. 关怀伦理视角下老年人良性数字融入路径建构研究.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6(1): 54-64.
- [21] CHEN Y, FEELEY T H. Social support, social strain, loneliness, and well-being among older adults: an analysis of 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14, 31(2): 141-161.
- [22] 孙凝翔, 韩松. “可供性”: 译名之辩与范式/概念之变. 国际新闻界, 2020(9): 122-141.

- [23] 刘康. “去中心化—再中心化”传播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双重困境及建构路径. 中国青年研究, 2019(5):102-109.
- [24] 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25] 张勇. 历史书写与公众参与——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考察. 东南学术, 2018(2):223-232.
- [26] 翟学伟. 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 框架、概念与关联. 浙江学刊, 2021(5):53-64.
- [27] 周雪光. “差序格局”: 一个理想类型的建构与阐释. 社会学研究, 2024(4):136-157+229.
- [28] HAMILTON G G. Patriarchalism in imperial China and western Europe: a revision of Weber's sociology of domin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984, 13(3):393-425.

The Digital Evolution of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Stratification and Power Practices in the Elderly Interest-based WeChat Groups

Shao Wanxia (South 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a senior art troupe and its WeChat group in a Wuhan community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extens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in the digital era.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hierarchical phenomena within the WeChat group perpetuate the “difference” and “sequence” inherent in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Group members integrate into the community through three modes—“communal entry”, “functional entry” and “acquaintance-based entry”—resulting in a hierarchical differentiation comprising core figures, key members, and ordinary participants. This differentiation leads members to exhibit distinct forms of power practices. The upper echelons consolidate their authority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establishing implicit regulations and monopolizing discourse, while the lower tiers exhibit selective silence and passive responses due to hierarchical authority and face-saving concerns. However, such differentiated media practices reconfigure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and its associated power is dynamics. Bonds based on blood and ge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are gradually supplemented or even replaced by shared interests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s, while power relations shift from explicit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to implicit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the classic concept of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in the digital context from three aspects: core ties, pattern boundaries, and power practice. It also provides a new observation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 change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elderly digital communities.

Key words: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elderly interest; stratification; power practices; WeChat group

■ 收稿日期: 2025-08-25

■ 作者单位: 邵婉霞,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 责任编辑: 刘金波